

南川文史資料選輯

第八輯

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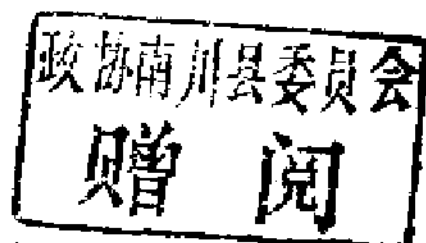
648400

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22.02

南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 八 辑



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

南川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辑

政协南川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南川印刷厂印刷

内部图书准印证：涪陵91字第102号

工本费：2.00元

2B93/18

顾问 张远东

主编 肖一进

编辑 张怀迅

张友华

校对 张怀迅

封面题字 李贤才

目 录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

- 在《新华日报》社工作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白成玉(1)
- 在《南川民众日报》社的日子里……………卓绿波(6)
- 我在南川的地下活动……………刘天正(16)
- 铜罐峡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斗争……………韦山银(23)
- 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楷模
- 记孙俊卿在南川的事迹……………张行义(32)
- 《细茅草》……………
- 刚解放时为发动群众写的歌……………蒋邦铎(47)
- 三次历险记……………韦庆光(49)
- 解放初期的县委机关生活……………蒋邦铎(58)
- 和平解放西藏亲历记略……………王富龙(63)
- 在县委土改工作队……………金光德(70)
- 公私合营四川省南川县工业生产公司……………李仲平(83)
- 从教四十年的回顾……………赵友伦(88)
- 南川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……………唐雍俊(97)
- 巨大的成就 曲折的道路
- 南川县水利建设概述……………陈廉隅(103)
- 南川果业史话……………睦国成(115)
- 从县林木良种场到楠竹山森林公园……………吴宪章(120)

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

- 辛亥革命见闻……………张德周(124)
辛亥革命对南川的影响……………陈鲁珍口述(126)
辛亥革命后的南川情况……………杨九皋(127)
南川辛亥革命的战将谈毅……………向荣礼(131)
我的祖父涂祯祥……………涂文钦(134)
唐绍汉传……………(138)
《南川县志》(民国版)有关辛亥革命的记述…(141)
辛亥革命以来南川知县、县长一览……………(145)

纪念太平天国一百四十周年

- 翼王石达开部队两次经过南川概况……………王令德(151)
太平军经过南川故事四则……………王令德(159)
石达开率部路经南川兴隆湾轶事……………许元隆(163)
《南川县志》(光绪版)有关太平军的记述……………(165)

在《新华日报》社工作的回忆

· 白 成 玉

我于1942年在南川简师附小高小毕业后，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，到重庆去找工作，经人介绍到一家酒店当学徒，光吃饭不给工资。当学徒是够苦的，每天起早摸黑，累得腰酸背痛，这些都能让人忍受，而不能让人忍受的是那些地痞流氓吃饱喝醉了就要打人，我们当学徒的更是深受其害。干了一年，实在是不能忍受就回到东胜家里。此时国民党“前方吃紧，后方紧吃”，拉壮丁比以前更凶，我在家里呆了两个月的时间，于1943年3月又去重庆托亲戚找工作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在《新华日报》社当上工人。

曾记得，当时给我介绍工作的人说：“《新华日报》是共产党办的报纸，随时都有被关杀头的危险。”我未加任何思索说：“只要有工作干，我什么也不怕。”进了报社，安排我的具体工作是搞印刷，报社领导非常关心我们每个职工，生活上给予我们照顾、体贴，思想上对我们引导，帮助我们提高。当时给我们讲过形势报告的有：吴玉章，王若飞、滕代远、廖承志、华岗、叶挺等。记得廖承志给我们作报告时，讲了一件他亲历的事，他说：他被敌人囚禁在渣滓洞，敌人想引诱他，审问时，一女特务故意张开大腿，挑逗地问他想不想老婆，而廖承志同志给予敌人有力的回击，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。通过学习，我认识到了，我干的

工作，不是单一的混口饭吃，而是在为党工作。《新华日报》是人民的报纸，是为人民说话的，领导同我们工人亲密无间，情同手足。我们干的印刷工作虽然脏和累，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。

1944年初，国民党办的《中央日报》，想从各方面压倒我们，他们组织了一次各大报社排印竞赛，让我们的排印工人也参加。比赛那天，《中央日报》的人洋洋得意地来到我们报社，扬言第一名是他们的。比赛结果：我社唐文敏检字2241个，倒一个字，误差不到千分之一，夺得了第一名，印刷方面《大公报》得了第一名，我们得了第二名，《中央日报》的检字、印刷都只得了个第四名，他们只有灰溜溜的走了。我们车间得了奖旗，是吴玉章同志亲笔题的字（题的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）。我们的胜利大长了同志们的志气，大灭了敌人的威风，我们积极响应党“编得好、出得早、销得多”的号召，报社的各个环节都争分夺秒，各个车间之间展开了劳动竞赛，排字车间过去每人一小时检字1000字左右，现在检2000至2400字，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；铸版车间过去每小时铸1版，提高到铸一版只用10多分钟；印刷车间在铸版前就完成一切准备工作，铅版铸好一块就装一块，一部机器同时上两块，时间由原来的半个小时降低到两三分钟，装完后立即开机印刷。速度之迅速使重庆印刷厂的同行们都感到吃惊。在竞赛中，我们还办了学习专栏，将作息时间、规章制度上墙，将各车间的生产进度、先进事迹加以表彰，同志们互相学习，互勉互励，思想、业务技术提高很快，这样我们的报纸比过去提前两小时完成任务，每天清早，天还未亮，大街小巷，就到处听到：“买报、买报，买今天的

《新华日报》”的呼叫声。

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九月，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和谈，此时的长江、嘉陵江暴发了特大洪水，沿江一带许多地方被淹没，报馆所在地化龙桥一带也是洪水滔滔，我们厂房的通道、报刊发行科、医务室、报童宿舍被水淹没，排字房、浇版房、装订房也进了水。国民党特务看到洪水淹没了新华报社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认为他们可以大谈一家之言了，面对这种情况，报社领导带领全体职工投入了抗共抢险斗争，记得当时同我们一齐抗洪的有社长潘梓年、总编辑章汉夫、总经理熊瑾珩等领导，经过大家几天几夜的共同努力，战胜了洪水。经检查各种机器设备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，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，把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的实况及时向国内外报道，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、真备战的阴谋。事后，报馆召开了庆祝大会，会上，宣读了毛泽东主席，周恩来副主席，林伯渠同志的慰问信。同志们听后深受感动，决心加倍努力工作，把《新华日报》办得更好。

1946年2月10日，重庆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在较场口集会，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，国民党对人民的觉醒非常恐惧，指使特务破坏会场，以一个名叫刘野桥为首的特务，大打出手，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打伤，这就是有名的较场口事件。新华日报社抓住这一事件，对民党压制民主挑起内战进行有力的揭露，国民党特务变本加厉，于2月24日出动了大批的特务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，国共两党双十协定墨迹未干，山城人民就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。形势越来越恶化，特务们还扬言要捣毁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，他们还组织了

一些地痞流氓搞了一次反苏反共游行。报馆的全体职工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作好了自卫防范工作，将全体人员分作一、二、三线，各就各位，机器都接上电源，敌人来捣乱就与他拼个你死我活。报社的领导还给全体职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，为了预防不测，帮助大家编了一套各自的假口供，以应付敌人审问。“如：问你为什么到新华日报社工作？”答：“因为生活所迫，找钱糊口。”问：“是谁介绍你去的？”答：“介绍人已远离他乡，我也不知去向。”等等。口供编好后各自牢牢记住，准备和敌人打嘴仗。敌人已风闻我们有所准备，始终未敢轻举妄动，我们的报纸也越办越兴旺。

1946年7月，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逝世，我们车间响应党的号召，为之写了祭幛：“民主失战士，教育失良师。”并参加了追悼会。

1947年1月11日是《新华日报》创刊九周年纪念日。这一天重庆各界民主人士像过盛大节日一样，一清早就从四面八方来到报馆，参加庆祝创刊九周年盛会，庆祝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。庆祝会之后，解放战争的胜利捷报像雪片飞来，1月中旬，枣庄地区歼敌五万二千余人，到二月中旬徐州地区歼敌两个师，生擒师长郝鹏骥，二月下旬鲁中莱芜地区歼敌六万余人，活捉其司令官李仙州，报社及时将这些喜讯报道，并将被俘国民党军官家属的信件在报上原文转载，这一着打中了敌人的要害，国民党窝着成羞，不顾舆论压力，于2月28日强行将报社关闭。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，那天凌晨，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重重包围了《新华日报》社，制高点架起了机枪，将报社外围的竹篱笆推倒，荷枪实弹冲

进报社，把报馆职工集中在球场上点名。点完名，敌人的一个头目宣称：“奉蒋委员长之命，查封《新华日报》，愿留的留下，政府可以安排工作，不愿留的可以回家，可给遣散费。”我们全体职工对敌人怒目而视，齐声高呼，“我们要回延安去”。敌人看软的一套不行，就将我们分开关到报馆的两个地方严密看管起来，连上厕所也跟着一个“警卫”。报社领导与警察头目经过几番交涉，才允许每天下午到球场活动一下。敌人为了防范我们，在报社四周布上岗哨、架上机枪。大家不怕威胁，照常愉快地进行各种活动，做体操、扭秧歌，这时报馆周围山上山下都站满了围观群众，他们被我们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感动，特务们竟强行把他们赶走，不准我们唱歌、扭秧歌，我们谁也不理他们，直到活动时间结束。就这样我们报馆同志被关了9天，由董必武、吴玉章同志与国民党交涉，蒋介石迫于各方面压力，于1947年3月9日用飞机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把报社全体同志送到了延安。

1991年10月

在《南川民众日报》社的日子里

卓 绿 波

1948年夏的一天，直接领导我的王绍全（现名王群，云南个旧锡矿干部、已离休）在重庆七星岗茶馆告诉我：为了配合全国革命斗争形势，迅速打开川东地区局面，上级派你回你家乡南川，开展青年、中上层统战工作，组织关系留在重庆，仍与我联系。（我回南川后，曾用化名李慎之向王绍全同志报告情况）7月底，我由重庆回到南川，通过同学、师生关系，在南极小学和师中校教了三个月的书（均是半席），于12月初到《南川民众日报》当采访，现将我在《南川民众日报》社工作的情况叙述于后。

12月初，国民党县党部秘书邹立阶来师中校找到我说：“让你到《南川民众日报》当采访。”我推辞说：“才能不够，不能当此重任。”邹一再劝说：“你在重庆大报《世界日报》都工作过几年，才能不成问题，我们德号（邹是德新社管事，我回南川后，打入德新社，被提为“闲五排”）上的人给你撑腰，你大胆的去。”当时，我觉得教书限制较多，范围狭小，当记者是“无冕之王”，接触广泛，往那里钻都是合法的，就顺水推舟，答应了下来。

我到报社工作，开始是在上课之余去。后来会议活动多，不方便，才找了我的族弟卓立群来为我代小学的课（学校编制仍是我的名字）。我在报社工作，是没有固定工资

的，由报社提供一间住室，供给伙食，偶尔发点补贴费，而且是视营业的好坏而定多少。

到了报社，才详细了解报社内情和地方政情。《南川民众日报》是由《南川民报·实验简报》改组而成。有董事会，由罗芷芳（县参议长）、王彦生（县税捐处长）任正副董事长。社长谭明渊（县参议员），副社长罗体璋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），总编辑金光德（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、师中校英语教师），陈道庸任主笔，我任采访兼代编辑，曾维良是县府的录事，与谭是同乡，兼任校对，三月起兼作记者。我了解和观察到，《南川民众日报》名义上是县参议会的喉舌，国民党县党部的舆论工具，实际上是南川新老两大派地方势力明争暗斗的一个场所（以仁号袍哥为首属老派，以德号袍哥为首属新派）。社长谭明渊属老派，但他一向为人正直，敢说敢斗，是参议会中有名的几尊“大炮”之一。他当过教师，颇有声望。金光德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虽有洋味，也还是个正直纯洁的无党派爱国青年。陈道庸其人则很复杂，是个老谋深算的穷读书人，笔杆子，也属仁号上的人，在南川文化教育界颇有些名气。曾维良还是学生面目，有正义感。罗芷芳是挂名的，罗体璋是罗芷芳的儿子，南川县党部书记长，大烟鬼、党棍子。郝汲澄是身兼多职的人（既是县党部秘书，又是董事会秘书），是“穿山甲”、特务分子。我决定扮演一个中间派角色，对谁都客客气气，以公正的老新闻记者自居，主动与谭、金、曾拉好关系，和工人打成一片。在社会上遇到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表现很随和。

在编采的方针、原则上，我与金的观点一致，他主动将他写的大学毕业论文底稿数十页交给我看，意在使我对地方

报纸有更多的了解，以便默契配合工作。论文题目是《地方报纸之经营》，涉及方面广，也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。我们在研究报纸版面、栏目、国内外要闻、副刊、广告等的安排上，意见比较接近，容易统一，其它人多系外行，并不碍事。我分工采访县城新闻外，还兼管地方通讯工作。我向过去爱投稿的人发出“特约通讯员”聘书十多份，多系各乡的小学教师，我原来较为了解的同学、熟人。扩大的地方新闻版面，约占全报的二分之一左右。我曾编了几期《通讯情况》简报，寄给通讯员作为写稿的参考和指导性的建议。

过去，报上凡提到共军、中共，通称为“匪”，我看了极不舒服、临到我发稿时把“匪”字勾掉，换成了“共党”、“共军”；以后与金光德商量：在标题中称什么“共匪”、“匪军”，他们不是明明白白的政党吗？过去国民党也承认了的，是什么匪呢？金光赞同这样做，将中央新闻稿中“匪”字勾掉换成“中共”、“共军”，所以报上凡经我和金签发的国内要闻中一律勾掉“匪”字，文内也如此。但陈道庸和其他人写稿，发稿就不一样，因此“共党”、“共匪”、“共军”、“匪军”在一个版面上同时出现。

报社内部斗争中最激烈突出的事，据我回忆起来有以下几件：

（一）一篇“社论”之争。写“社论”“专论”之事本为陈道庸的专职，但他外务太多，经常不来报社，来了一下又走了。当时县参议会有关决议要追收烂粮。所谓“烂粮”是历年土豪劣绅拖欠未缴的公粮，大约有几十万石。我根据

决议内容写了一篇《必须追收烂粮》的社论。社论中指出：

“所谓烂粮，是一些地方豪绅、官僚拖欠应缴的田赋而成了烂帐。他们的田租并未少收一粒，国家田赋不交，实无天理。田赋拖欠之事，一般农民和小户人家拖欠，轻则差役追索，重则丢监关押；而对豪绅、官僚则受賄遮掩，官官相护，积久便成了“烂帐”“烂粮”。若将这些“烂粮”追收起来，不但县财政困难得到缓解，积欠公教人员工薪亦可补足……”在发此稿时，陈道庸认为“过火”，表示反对（实则因系其专利，有损于他的威信）。谭社长站在参议会立场上表示支持，金加以修改，终于发表。因主旨是县参议会决定，也就过去了。但我们与陈道庸隔阂由此加深。

（二）揭露黑幕。由中共社大支部通过我安排回乡在太平场以开“夫妻酒商”为掩护的谢德庆、李静曦二同志，以化名揭发太平乡乡长、大恶霸谢超凡和乾丰乡乡长、西北联防主任尧德俊等人，贪污索贿，乱拉壮丁，杀人灭口以及太平乡滥发不兑现的“银元卷辅币”等劣迹，在报上发表以后，在两个乡引起轰动。谢、尧等几次派人来报社查对原稿笔迹，追究投稿人责任。我运用分管地方通讯的权力和新闻法令拒绝查稿，允许用“来函照登”形式补救。而特务分子郝汲澄则偷偷将原稿偷出，幸是化名，又是李静曦手抄，也无法栽到谢德庆同志头上，抓不着把柄，才算完事。

（三）利用“验毒”结果，打击水江乡地方顽固反动势力。地下党员邹泽杨去水江担任中心校长，他聘用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作教师，有陈玲辉（支书）、胡心良、谭兴进、周继达等，排斥了原盘据该校的部分落后顽固教师。他们另办私立学校抗衡。郑兆丰、朱元模等纠集当地地痞流

氓骚扰学校，朱出手毒打中心校教导主任徐子樵，成重伤吐血，卧床不起。邹进城对我叙说以后，我在《地方新闻》栏内揭露此事，打击了地方落后势力。据金光德说：他曾代表报社社长慰问徐老师、邹校长等人，并会见乡长金秩卿谴责此事。过后不久，南川县禁烟勒戒所公开验毒，凡验明有毒之“瘾民”，一律集中关押勒戒。受检“瘾民”中就有由水江教师具名检举的幕后策划者之一郑××在内，邹来向我说了后，我便利用这个机会打击他的威风，叫他出丑。县勒戒所验毒时按照规定，特邀请各机关法团及新闻代表临场监督，公开验毒结果。我在开验之前，提问主持人，“化验显示何者为毒？何者为无毒？”经主持人说明并示范后，逐一化验显示结果，大家齐声喊叫：“有毒！有毒！”最后将验明有毒者的姓名、地址、职业公布，予以勒戒。为免事后受唆篡改，我于次日在报上公布当天验毒经过及其结果，使这批“瘾君子”无一滑脱，在全县大众面前出了大丑。

（四）打断卸任警察局长的财路。南川县警察局长李华钦，是个贪污索贿政治上也很反动的家伙。1949年3月12日“植树节”，城内及郊区中小学师生在北较场开纪念大会，道南校进步教师韦庆光等在中共南川县委负责同志的支持下，以大会主持人“不按时开会，妨碍学业”为由，拉起中小学队伍离场返校，使后来的大会开得松松垮垮，冷冷清清。李华钦在大会讲话中大放厥词，慢骂“带走学生、拖垮大会”，还说：某些党政要人“不敢挺起腰杆反对贪污腐化，勘乱剿共”，说什么“我是军人，不怕打黑枪，宁愿掉头洒血”等等。我对他的丑恶表演十分恶心，次日除在报上作充分报道外，还说“不按时开会，耽误学业，带走学生情有

可原。”对李的表演作了揶揄性的描写，说他“唾沫横飞，捶胸顿足，如丧考妣……”以后碰到李，李说：“写得过火了。”过了不久，得到官方可靠消息，李将调奉节县任警察局长，我在报上披露此事后，打断了他趁机贪污勒索的财路，使李甚为恼火。

（五）利用国共“四月和谈”时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欺骗人民，装出真要“实行民主”解除了报禁之机，我在《南川民众日报》上先后全文转载了《内战的责任属于谁》（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撰，原载《大公报》），《孔尚任谈时局》（原载重庆《世界日报》），和谈期中中共提出的《八项条件》和《惩办战犯名单》，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。

这些文章和文件的登出，对国民党反动头子无异是当头一棒。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登出后，特务分子郝汲澄来找我谈话，责备我不该转载这些文章，说什么“这样对本党不利”。我反驳说：“重庆的《中央日报》等几家大报都登载了，难道他们不也是‘本党’吗？我们地方报纸为什么不可以转载。”郝说：“重庆大报刊载对南川影响不大，南川人很少订阅这些大报纸，你这样做就扩大了影响，《南川民众日报》是遍及各乡的哟！”我说：“未见得，想看的要想方设法找来看，不想看的送跟他也不看。有什么扩大不扩大？”谈得不欢而散。

“四月和谈”破裂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把“民主”的幌子收起来了，重庆开始了对新闻界进步力量的镇压。南川也跟着干起来了。据说在董事会扩大会议上（有《南川民众日报》正副社长、总编、主笔参加），有人说报纸刊登、转载了错误文章、消息，提出要追究社长和主笔的责任。谭明渊